

反思美国特色史学的努力:柯文“中国中心观”探析

王 瑞

(南阳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摘 要:柯文强调美国史家的身份、美国特色史学,旨在凸显“中国中心观”展现的内部视角或移情方法对于美国中国学家的价值。作为深受本国政治历史文化熏陶的美国史家,当其研究异域文化中国历史时,要完成内部视角观察中国的任务、达到求真的目的,只能用移情方法去感受、去审视,进而发掘真正属于中国的问题。正因为柯文强调从内部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以此标准衡量“中国中心观”的四个特征则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第一个特征,其他三个特征将失去存在的价值,这反映了“中国中心观”的时代局限性。随着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一些其他因素加入其列,可补益“中国中心观”的不足。

关键词:柯文;“中国中心观”;内部视角;美国中国学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3)06—0049—05

收稿日期:2022-04-27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国学者柯文的中国学研究”(2018BLS012)阶段性成果;南阳师范学院国家社科培育项目(2022PY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瑞(1981—),男,安徽固镇人,历史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讲师。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3.06.016

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是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然而一些学者从具体历史进程角度批评柯文过分强调内部因素而忽视西方在近代中国的作用,认为“冲击—反应论”有其合理层面。这种认识忽视了柯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重点探讨的是“历史学家的角度”。该角度主要涉及美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环境影响下的美国史学的前提假设,它们左右了美国史家的问题意识,进而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史学研究。而冲破文化、政治、思想环境束缚,只能依靠“中国中心观”提倡的移情说。如果没有“历史学家的角度”加以规范,关于具体历史进程中涉及的内外因素的争议,在是否破除西方中心论面前,将会失去讨论的必要。目前学界对此涉及不多^①,笔者对此作一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谁为中心:学界关于“冲击—反应论” “中国中心观”的争议

20 世纪 80 年代,柯文曾明确说过,相对于“冲击—反应论”,“中国中心观”在理解中国方面“更加地

深入”,代表着“美国历史编撰学”的进步。在他看来,“冲击—反应论”等早期理论太注重西方这种外在因素在近代中国发挥的作用,忽略了中国内部因素,从这一角度审视,强调“内部过程和动力”的“中国中心观”则是代表着一种在“正确方向”上的进步^②。这是从“历史直接参与者的角度”观察出来的,说明“中国中心观”确实含有用“内部动力因素”代替“外部刺激因素”的成分。为什么柯文会这么说?

(一)“冲击—反应论”的局限性

1954 年费正清等人就说过:“‘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击’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称之为‘中国回

^① 相关成果主要有:李学智:《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10 年第 7 期;王瑞:《“中国中心观”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7 年第 2 期。

^② PAUL A. COHEN, “Self-strengthening in ‘China-centered’ Perspectives: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70 页。

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但它显然只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要把它置于中国的总体历史中去考察。”^①费氏等人虽意识到了中国回应与西方冲击之间存在不对应的一面,但是从后来的学术发展来看,与西方无关的一面还是受到美国中国学家一定程度上的忽视。为此,柯文提出了层带说,即“最外”“中间”及“最内”层带,希望把“冲击—反应论”放在一个合理的使用范围内。但是层带说并不能解决上述困境,即使是最适用于“冲击—反应论”的“最外层带”,也并非所有的中国回应都只是针对西方冲击,也可能是内部因素的延续。尤其是在思想领域,随着近代中外交流的频繁,一部分西方思想或早或迟与中国本土思想融为一体,难以区分。在此情景下,“冲击—反应论”及层带说受到了质疑,而“中国中心观”则相应增添了合理性,为此学界争论不断。

(二)学界的争议

张朋园于1986年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中国中心观”比“冲击—反应论”好,内部因素的儒家思想“应变的能力”“尚难获得答案”^②。柯伟林著文首先肯定了“中国中心观”的价值,但他又说“中国中心观”对于民国史研究有一定的不适应性。该时期中外交流频繁,西方对中国很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内部因素也起到了作用,但在对外领域一定是西方在中国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在这一标准审视下,“中国中心观”未必就如“冲击—反应论”在解释中国方面“恰是好处”^③。周锡瑞既不承认中国发展“所有动力”来源于中国本土(中国中心观),也不认为来源于“西方的入侵”(冲击—反应论),他把“中国中心观”与“冲击—反应论”视为“中国发展论调”的“两个极端”^④。“两个极端”论等于否定了柯文理论对于战后美国历史编撰学作出的贡献,也使后人无法理解柯文在“正确方向”上的进步这句话的深意。这样看来,无论中心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无法获得学者的认同。

汪熙则从哲学角度指出,中国内部“运动规律”在“中国发展进程”、方向等方面起到“决定”作用,西方作为外部因素,无论好坏都须经过中国内部因素吸收转换,方能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⑤柯文赞同汪熙的观点,指出在近代时期,很多国家虽受西方影响,但由于内部状况不同,发展结果各有千秋。他还以近代中日为例说道,虽然两国都受到西方冲击,但结局迥异,原因就在于两国内部因素发挥了不同作用。^⑥

细究上述观点,显然涉及的都是具体的历史进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内部动力与西方冲击之间的关系,根本无法作出严格的区分,尤其是面对中外交流频繁的近代中国,柯文的层带说只是一种笼统的解决方案,无法做到科学的应对。这一点柯文也很清楚,他说,19世纪中国如何回应西方冲击,由于牵涉因素众多,必定繁琐庞杂。一些事件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很有可能与西方冲击没有或少有联系。而另一些事件与西方有关联,但绝不能简单地把事件归结于“仅仅”是对西方的“回应”,很可能牵涉到对内部因素的“回应”。所以,“谁为中心”引来的更多可能是一种无休止的争论和误解。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中心观”呢?这就涉及“中国中心观”另外一层含义即“历史学家的角度”。

二、“中国中心观”:“历史学家的角度”下 美国特色史学的反思

柯文说,《在中国发现历史》探究美国中国学著述时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一个是“历史直接参与者的角度”,另一个是“历史学家的角度”。柯文经常混用两种角度,但其关注重点却是第二角度,主要探讨美国中国学家在从事19、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时使用的框架结构^⑦。可见,柯文主要探讨的是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而非亲历者经历的历史。

(一)美国特色史学的形成及影响

柯文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诸多因素限制史家研究取向、对象、方法的选择,但最重要的是史家生活学习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环境”,其他因素则居于次位,而外来影响只限于史料等技术领域,理论取向等方面是受影响最浅的。他举例说,中日史家蒙唯物史观影响,重视“社会经济”因素探讨,多年后,美国史家转向类似问题,并非源于中日史学,而是国内变

① 费正清,邓嗣禹著,陈少卿译:《冲击与回应》,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9页。

② 张朋园:《柯著: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

③ 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6期。

④ 周锡瑞,王平:《世界的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4期。

⑤ 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⑥ 西村成熊著,徐培华译:《“中国中心观”倡导者柯文教授访谈录》,上海中山书社:《近代中国》第6辑,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年,第286—287页。

⑦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页,第227页。

迁冲击。按照柯文的解释,美国史家拥有不同于其他传统的问题意识,源于美国本土环境的培育,所以柯文才会明确说道,《在中国发现历史》主旨是对“普遍影响美国史学的某些前提假设”展开探究,而不涉及其他异域史学。他的做法既不是为了拔高美国史学的地位,也不是为了凸显美国史学独立自主的状态,更不是否决甚至贬低异域史学传统对美国史学的冲击,柯文主要是在说明美国史家的问题意识会将其他外来影响消解、内化到自己的史学研究中来。经此“过滤、加工”,美国史家输出的问题最终会被打上“美国‘特色’的史学”烙印。^① 以此逻辑推演可以看出,美国史家问题意识催生了美国特色史学的产生,而美国史家问题意识实质上富有美国特色,它是由美国社会文化环境滋养出来的前提假设孕育而成,所以一些接受其他传统而非美国环境影响的学人不在柯文讨论之列。柯文这么做就是为了确保学人的前提假设一定是美国的,而非其他,柯文的研究目标也正是这些具有美国特色的前提假设。

柯文认为研究西方介入近代中国后的美国中国学家,“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脑海中的“种族中心主义”给史学研究带来的歪曲。^② “种族中心主义”也就是西方中心论,它受史家所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的影响。在西方中心论笼罩下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以西方的标准提出问题,并收集中国史料加以回答。这是一种典型的公式主义做法,答案早已有之,中国史料的作用只是充当西方问题的注脚。至于问题是否在中国真实存在过、是否能够增进对中国的理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中国学家想从中国研究中获得什么。^③ 显然,评判标准来自西方。这些因西方文化政治环境影响造成的歪曲,如果要解决它,也必须从文化政治环境入手。

(二)纠正西方中心论的尝试:“中国中心观”的提出

柯文“中国中心观”最核心观点之一,被林同奇概括成移情说,正是为了纠正文化差异造成的歪曲。林氏解释道,移情并非让史家赞同研究对象的“思想感情”,而是将心比心地感受研究对象的情感、境况,进而理解对方。具体到柯文的研究,移情则变成美国史家神游到中国历史进程中,以中国人的视角感知中国历史,这种以内部视角观察历史的方法,让美国史家可以尽量避免先入为主。但要做到这一点,史家必须能够挣脱所处社会文化思想乃至个人“皮”的束缚,“钻进”中国“皮”中去。^④

鉴于此,柯文说道,虽然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时段是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不可避免要处理中

西方因素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但从整个研究历程来看,柯文持之以恒关注的始终是如何深入地进入中国人的世界,尽可能以内部视角建构出符合“中国自己经历的事情”。“尽管说西方人的理解也很重要”,但西方式问题却并不一定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总之,柯文想要摆脱西方中心论对中国研究的歪曲,用中国人的身心感受中国的过去。笔者认为这才是理解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关键点。柯文说,“中国中心观的核心品质”是要求美国史家培养出源于中国历史的问题意识,但不等于忽视外来因素的影响,而是要求美国史家在运用源自西方语境下的理论进行中国历史研究时,不能“削足适履”,而应该保持“足够的敏感度”^⑤。所以柯文对一些概念极为警惕,反对把西方语境下的概念当作囊括一切的思想框架。^⑥ 他认为“历史学家越是注意到他们研究的假设深藏于他们对过去提出的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受到这些假设的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小”^⑦。

但“中国中心观”摒弃西方标准、注重内部视角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消除西方中心论。柯文只是期许西方史家对歪曲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尽可能降低歪曲带来的危害,让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色彩”少一些,这对西方史家来说,“要做到这点却是可能的”^⑧。从这个层面上讲,柯文没有否认“冲击—反应论”的有效性。不仅如此,“中国中心观”对内部视角的提倡,还有可能导致忽视局外视角优势的可能。柯文说很多人指责他“没有看到局外视角的优势。在此书中,我几乎关注的都是局外视角带来的消极和歪曲的后果”。后来柯文接受了批评,指出局外视

①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前言第47—48页。

②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序言第53页。

③ 朱政惠主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④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译者代序第21—22页。

⑤ PAUL A.COHEN, “Introduction to the 2010 Reissue: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i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x-xl, xlii.

⑥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序言第56—57页。

⑦ 柯文:《20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文史哲》,1998年第4期。

⑧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序言第53页。

角“也是阐明真理的一种方式”。从这点看,柯文当初确实忽视了美国史家局外者的功用,但是正如易劳逸说的“无论读者是否同意他对书中列举作者的批评,但是我们从他的书中,是可以得到‘警惕西方中心论歪曲’的忠告”^①。正因为柯文非常清楚局外视角有很多缺陷,所以注重从内部视角看待中国历史的“中国中心观”才被其作为纠正局外视角缺陷的方案提了出来。

总之,柯文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审视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针对的是美国特色史学。他希望美国史家一方面能够从内部视角观察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在运用西方的理论、概念等时,要注意适应度,而前者是柯文提倡的重点和核心。

三、选择性与发展性:作为“研究方法集合”的“中国中心观”

1984年,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是为了解决当时美国中国学的弊端,具有选择性特征,同时它也是一种发展中的取向。

(一)“中国中心观”四个特征解析

从内部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以此标准审视柯文总结的“中国中心观”的四个重要特征,即“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中国社会的“横向”分解、中国社会“纵向”分解、欢迎社会科学等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第一个特征,其他三个特征将失去存在的价值。柯文明确说过第二特征是以“地方为中心”而非中国^②。这种取向是针对“冲击—反应论”将中国视为整体作出的反思。第三个特征是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精英史,将视线转向下层研究。第四个特征,本身无中心可论。

无论后三种取向怎样改变了以往研究模式,如果没有按照第一特征研究中国问题,也会导致西方中心论。如美国自由主义史家狄百瑞认为儒家文化能够产生有意义的变化,这与以前否认中国传统的论调是不同的,但柯文认为狄百瑞的问题意识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他指出:“自由主义是一个西方传统孕育出的概念,所以我认为把它直接用于分析中国历史问题是不恰当的……我忧虑的是,通过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到一些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现象”,让“我们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去描述中国历史,实际上却离真正的中国历史很远。”^③虽然狄百瑞的结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成见,但是改变不是目的,主要目的应是还原真实历史。后来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新

序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警告。他说,我们在克服中国缺乏自我革新动力、需要借助西方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偏见后,又形成了一种新偏见,即中国“只有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标准发展轨迹”的历史现象才是美国中国学家研究主题。^④看来,西方中心论并不仅仅是柯文列举的三种模式——“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帝国主义论”,只要是以西方作为衡量标准都可被视为一种歪曲。

(二)选择性:矫正三种模式弊端的“中国中心观”

虽然西方中心论不限于三种模式,可柯文依然将其作为评判对象,只能说明这是有意为之。柯文说,《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选择性是较强的”,它主要关注19世纪这一时段,因为该时段对柯氏考察“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另外,《在中国发现历史》评析的学术著述、设定的问题,也是刻意为之的结果,“它们都只反映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所有历史学家萦回脑际的理论思想问题”^⑤。很多学者批评柯文选择的时间段以及著作都是刻意的,恰恰是没有注意柯文并不是想写出一本完全覆盖所有美国中国学著作的论著。这种误解扩大了“中国中心观”解决问题的范围。柯文总结出的“中国中心观”是有针对性的。

柯文说“中国中心观”“与其说是单一、清晰的取向,不如说是林林总总研究方法的集合”^⑥。即便如此,“中国中心观”却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中国学家中“日益明显的一组趋向”,这些趋向一方面回应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内部发生的一些变化,另一方面回应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中的“反帝与自我批评倾向”^⑦。显然,“中国中心观”反映的是20世纪70

① LLOYD E. EASTMAN, “Book Review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by Paul A. Cohe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 (1985).

②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1页,第178页。

③ PAUL A. COHEN, “A Reply to Professor Wm. Theodore de Bar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5 (1985).

④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3页。

⑤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前言第46—47页。

⑥ 柯文著,刘楠楠译:《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59页。

⑦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1—202页。

年代美国中国学的变化,而回应的则是该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变化。

第一种回应体现了美国学界发展的内在理路,显示了学术思潮对美国中国学的影响。兹以魏斐德为例。我们知道,魏氏的研究风格与美国中国学的第一、第二代学者不同,这种风格与欧洲社会科学对史学研究的大举介入有着莫大关系。魏氏就曾说过他深受“法国的学术风气”的影响,其关于清末广东社会动态的博士论文正是借助“法国历史学者处理通俗社会史的方法”,从而使魏氏的研究避开了“冲击—反应论”带来的研究主题限制,投入到“地方史”研究领域。魏氏说,法国年鉴学派注重下层社会研究,这在精英史盛行的时代意义非凡。费正清就认为“群众性太强,太走下层路线,总是一事无成”^①。地方史研究成为一种纠正“冲击—反应论”的重要取向。

至于第二种回应,柯文说,反越战运动对学人的影响复杂多变,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一种影响是直接的,以周锡瑞为代表,他们直接用“帝国主义”去阐释“清末及其民国历史”;另外一种影响是间接的,以孔飞力为代表。与直接影响相反,在研究中国近世史时,后者不太看重帝国主义因素,而是走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上,打击了“早期美国史学所固有的思想帝国主义”。“（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西方中心论模式”涉及的正是费正清和列文森的“冲击—反应论”及“传统—近代论”,而从“中国本身出发的历史感”则是“中国中心观”的移情,这种从中国出发的移情给予美国史学“思想帝国主义以决定性的打击”说的正是一种针对性。^②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没有对三种模式的回顾,柯文或许就总结不出具有针对性解决方法的“中国中心观”。

（三）发展性：没有定于一尊的“中国中心观”

正因为时代的局限,以及“中国中心观”起初的选择性,所以随着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中国中心观”除第一个特征外,一定会有其他因素加入其列。柯文说:“我不认为中国中心观是一个单独的完整的内在一致的方法,它是一组趋向,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突出。当我探讨这组趋向时,确实用了方法这个词,不过是单数形式,但是我告诫人们,这只是为了表述方便……我确实相信中国中心观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方向,我们应该继续前行。但是在谈论这个方法时,我用的是开放的,而不是排他独断的词汇。”^③既然是“开放的”,说明“中国中心观”是可以补益的,这一点柯文非常清

楚,他说:“我在二十年前首次讲述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时——我得马上补充,那时候,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只是将许多学人正在运用的一套研究方法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认为这套研究方法对美国中国学研究具有积极影响——我刻意地把这套方法和有关中国过去的研究联系起来。事实上,《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介绍这种方法的那一章的题目正是‘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当时“中国中心观”还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不成熟,多年后柯文认识到此点而反思道:在一些历史事件研究中,可能无法使用“中国中心观”,多数情况下,“中国中心观”“需要和其他的研究取向互为配合”^④。这正是对当初选择性的一种发展和增补。

结 语

柯文曾说,他非常担心中国史家能否理解美国史家在从事中国学研究时产生的争论焦点及惯用术语,能否理解《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的观点、问题对于美国史家的意义。强调史家国别、争论焦点及惯用术语,柯氏旨在凸显“中国中心观”展现的内部视角对于美国史家的价值。而要完成内部视角观察中国的任务,达到历史求真的目的,美国史家只能用移情去感受和审视,进而发掘真正的中国问题。

柯文对移情方法的运用,变古今问题为中西问题,企图降低文化差异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造成的歪曲。所以第一部分探讨的中心问题以及学者的争议,只能放到移情视角下审视,“关注内部过程和动力”并非周锡瑞说的两极问题:如果依移情标准,则关注就是一个中国问题,反之,则依旧是一个西方式问题。这样看来,以“中国中心观”发掘出的中国问题,并不是完全摒弃西方,一些问题可能逃脱不了西方的影响,而另一些则可能与西方毫无关系,它有两重涵义:其一,必须是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经历过的中国问题;其二,评判标准也必须源自中国。

① 邹羽,徐有威:《我们这一代汉学家:魏斐德教授访谈录》,《史林》,2008年第4期。

② 柯文:《美国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的新动向》,《复旦学报》,1981年第6期。

③ PAUL A.COHEN, “State Domination of the China Field: Reality or Fantasy? A Reply to Robert Marks”, *Modern China*, 11 (1985).

④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0—261页。

（责任编辑 李麦产）

have the same impact on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oyalty services and communicatio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have a greater role in improving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③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China's productive service trade competitiveness on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ownership.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Patterns and Obligatory Compliance in Combating Organized Crime

Cai Jun, Pan Zhiyuan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imited resources for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the increasingly varying activities of money laundering, the regulatory model for combating money laundering in organized crime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being "rule-based" to "risk-based". Under the "risk-based" anti-money laundering regulatory model, obligated institutions should scientifically assess potential money laundering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combating organized crime money laundering,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riminal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zed crime, and reasonably allocate regulatory resourc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provisions in the Anti-Organized Crime Law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 and relevant legal norms. Including the regula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by criminal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scope of anti-organized crime money laundering obligations aligns with the practical need to "cut off the money flow and blood supply" of organized crime and also reflects the intent of the Anti-Organized Crime Law, without conflicting with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of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 The Anti-Organized Crime Law imposes obligations on obligated institutions regard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roperty restrictions for anti-money laundering purpose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isk-based" anti-money laundering regulatory model, the key to fulfilling the former lies in the pri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core anti-money laundering obligations stipulated i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 while the latter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temporary freezing measures stipulated i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Single System Scheme of China's Criminal Participation System

Yuan Fa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the attribution of China's criminal participation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it with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joint crimes in China. Interpreting China's accomplice legislation as a system of attribution or dual distinction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inconsistent, but also difficult to meet practical nee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ve performance, the unitary system is more compatible with China's Criminal Law;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approach adopted by judge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ingle system. As for the criticism of the single system that "undermines the clarity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leads to rough sentencing", both are due to a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gle system.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substantive law and judicial theory, it is advisable for China's criminal participation system to adopt a single system plan.

"The Golden Bell Song" and the Vanished Big Golden Bell

Ge Benche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large bell of the Jin Dynasty was preserved in Minglun Campus of Henan University in Kaifeng, which was used as an antiqu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observe. This bell was cast by the time of the Emperor Xuanzong of Jin, that is, during the period that Jin reformed Bianjing as Nanjing and Kaifeng as the capital. The bell witnesses the struggl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Jin, Song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hich is a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Jin Dynasty once moved its capital to Kaifeng. Its inscriptions are rich in information, which can form mutual evidence with the relevant records in the Golden History and other documents, and have hig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ics value. However,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Henan University was forced to move inside, the campus was occupied by the invading Japanese army, and the ancient bell as a precious cultural relic disappeared. Although the "Golden Bell Song" written by the scholars who saw and studied the bell at that time is a poem, it preserves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rge bell in the Jin Dynasty and provides historical clues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relic.

Rethinking the Efforts of American "Characteristic" Historiography: An Analysis of Cohen's "China-centered Approach"

Wang Rui

Cohen emphasizes the identity of the "American historian" and emphasizes the "characteristic" histori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aiming to highlight the value of the "internal perspective" or "empathy" approach shown by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to American Chinese scholars. As an American historian who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his own country's politic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when he studies foreign cultures as Chinese history, and needs to complete the task of observing China from an "internal perspective"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seeking truth, he can only use the "empathy" to feel, examine and then discover the problem which really belongs to China. As Cohen emphasizes to observ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with "internal perspective", measure the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with this standard, we can see that without the first feature, the other three characteristics will lose the value of existence, and this reflects the era limitations of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other factors has added to improve the lack of "China-centered Approach".

Western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Russian Poetry

Liu Wenfei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Poetry of Michael Wachtel, professor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US, is a monograph on Russian poetry, written by a western slavist and mainly for the English audience, has a valuable significance for us. The "western view" of the author'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Russian poetry could give us many reference and help